

# 试论口述史在遗址博物馆中的运用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y in Site Museums

陈海霖

Chen Hailin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北京, 100070)

(Beijing Dabaotai Western Han Tombs Museum, Beijing, 100070)

**提要:** 文章理顺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发展脉络, 分析影响口述史博物馆化的主要因素, 阐述遗址博物馆发展口述史工作的必要性, 探索口述史与遗址博物馆工作有机结合的方式方法, 指出口述史在遗址博物馆中的运用, 对于抢救历史资料、扩充馆藏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丰富展览形式、拓展教育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口述史 遗址博物馆 新方法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in museums and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effecting oral history applied to museums. Second, i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ite museums carrying out oral history research work, and explores the ways combing oral history with the work of site museum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y hold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sav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expanding the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of site museums, 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enriching the form of exhibition and exert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site museums.

**Key Words:** Oral history; site museums; new metho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一、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发展

21世纪以来, 口述史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 成果涉及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多个领域, 其传播也突破传统小众传播特点, 广泛进入大众传播媒体。口述史

在博物馆领域中的运用起步较晚, 经历了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认为文献、典籍“不尽足凭信”, 必须奉金、石等有形器物为“首重资料”, 更是排斥“口说无凭”的口述史料<sup>[1]</sup>。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观众需求的多元化, 社会对博物馆的要求提高, 传统的博物馆观念不断发生变革。2002年10月24日, 国际博物馆

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暨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国际学术讨论会通过《上海宪章》，提出“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与促进”，这是对博物馆界涉足口述史的认可和倡导。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重新修订博物馆定义，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向公众开放，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2001年修改的博物馆定义相比，将博物馆的保护和研究对象拓展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逐步改变以“物”为主、注重实物藏品的观念，在收藏、展示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理念，开始探索口述史与博物馆工作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功能。

在西方，口述史成果很早就运用到博物馆中，如美国史密森学会中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成功收藏了为数不少的口述历史访谈，并以录音和录影的方式将其展示给参观者，从而使口述史成为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2]</sup>。在中国，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运用逐渐被重视，革命历史类博物馆、民族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都对口述史的运用进行了有益探索。如革命历史类博物馆因所反映历史事件的近时性，增强了开展口述史的必要性，口述史的叙事性特征以及社会化的视野与其展陈的意义多有吻合之处，能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补充历史事件的细节，深入解读革命文物<sup>[3]</sup>。民族博物馆运用口述史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发展轨迹、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揭示藏品背后的社会情景和根源。民俗博物馆将传统工艺通过技艺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展示给观众。总之，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运用能促进诠释方式和诠释主体的多元化，解读关乎展品的社会历史情境，拉近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sup>[4]</sup>，拓展了博物馆的功能，是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

## 二、遗址博物馆开展口述史工作的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为适应观众文化需求的多

元化，传统博物馆学观念发生变革，不再只专注于物，认为应该注重人与物的结合。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鹤田总一郎就提出，博物馆是“人与物之间的结合”。他在与苏东海先生的学术对话中指出，“必须把对人的研究提到与物平等的水平才能成为真正的博物馆学研究”，并预言21世纪的博物馆学主要是研究“人与物的结合”<sup>[5]</sup>。21世纪初，苏东海先生重新强调：

“人与物的结合是博物馆本体研究的出发点。”<sup>[6]</sup>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运用就是对人与物结合理念的 Actual 践行，博物馆关注的不仅是物的证史功能及其艺术、科学价值，而且还有当事人或旁观者对物所要表达的社会与生活意义的个性化理解<sup>[7]</sup>。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遗址博物馆逐渐兴起，“在我国所有的专门性博物馆中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近几年以来其增加的速度已经高过所有其他类型博物馆，并远高于其他专门性博物馆”<sup>[8]</sup>。所以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类型之一，应积极挖掘口述史的价值，探索口述史在博物馆工作中的运用，践行人与物结合的博物馆学新理念。

遗址博物馆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诸多挑战。遗址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该遗址出土的文物，其展示内容也是围绕该遗址。因遗址反映的是一个固定的、凝固的历史时空，它是历史长河的一瞬，或一个方面，所以藏品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人类社会活动或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文物或标本<sup>[9]</sup>。与综合型博物馆相比，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单一，展示内容不够丰富，观众参观时的可选择性较小，而且专业性强，更多的是吸引一些专家、学者，而对普通观众来说有距离感。这些都对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提出挑战，要求其创新工作方法，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和优势。遗址博物馆开展口述史工作是对博物馆学新理念的最好实践，用口述史的方法，以语音、影像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当年参与遗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亲历者的回忆，然后将这些鲜活的史料和口述史研究成果运用到博物馆的工作中，为藏品研究补充新的史料，深入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进一步丰富展览的形式与

内容,拓展教育公众的空间。口述史通过发挥其自身优势,成为遗址博物馆实现教育、研究、收藏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

### 三、口述史在遗址博物馆基本功能实现中的运用及意义

#### 1. 在收藏职能中的运用

人类积累和传承丰富的文化遗产,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中“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改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藏品拓展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遗址博物馆运用口述史的方法,通过对当时遗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亲历者进行访谈,综合采集其口述文字、声音、影像资料,加以整理与研究,并收藏和利用。这将有利于丰富藏品资源,改变遗址博物馆藏品单一、专业性强的局面,促进藏品的多元化发展,开辟藏品资源的新领域。一些遗址是早年发掘的,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亲历者已年过古稀,抢救、发掘、整理这些“活的史料”也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遗址博物馆开展口述史工作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对历史传承方式的创新。如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在考古发掘40周年时做的口述史项目,对当时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整理出版《大葆台汉墓考古发掘暨博物馆建设亲历者口述史》,这对抢救、保护这些“活的史料”具有非凡的意义。

藏品保护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自然因素的作用,藏品会向损坏、衰败、消失的方向发展,为消除病害、阻止或延缓劣化,需要采取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对藏品进行修复和保养。遗址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一般在出土时做过相应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但由于有的遗址发掘年代较早,发掘完后经过一段时间才建立遗址博物馆,所以关于文物当时的出土情况记录、保护措施档案很难保存下来,而这些资料往往对文物日后的修复、保养起到重要

参考作用,就如病人的病历,是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中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医疗质量。文物出土时是如何提取、清理?做过怎样的修复和保护?发现了什么问题?采取了什么办法?遗址博物馆可以通过对当时参与文物保护的亲历者进行口述史访谈,收集相关资料,同时也可以征集亲历者当时的工作记录。这些资料将弥补文物保护档案的缺失,为当下和未来开展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以采取合理的技术手段,更好地保护文物。如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对大葆台汉墓发掘时参与文物保护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王丹华、冯跃川先生进行访谈,收集当时对车马坑、“黄肠题凑”木材所采取保护措施的口述资料,还从冯跃川先生处征集到当年对车马坑的马骨除霉的工作笔记,这些都为以后开展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 2. 在研究职能中的运用

“科学研究(首先是藏品研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工作基础,发挥着‘物’与‘人’(藏品与观众)之间的中介作用。”<sup>[10]</sup>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对博物馆的要求提高,博物馆应加大科研力度,充分挖掘馆藏资源,推动博物馆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职能。博物馆科学、系统地征集口述史料,既是收集历史故事,让历史鲜活起来,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及出土文物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经过深入的研究,科学的阐述,才能更好地呈现给观众。虽然有历史文献、发掘简报、发掘报告、研究性论文论著等相关资料,但仍需要口述史料为研究补充参考资料,提供新思路,拓宽研究范围。如有的遗址发掘年代较早,由于当时的认识深度、发掘水平都有限,在编写的发掘报告中留存疑点,一些问题仍有很大认识空间。通过亲历者口述发掘工作的细节,以及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亲历者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和研究,这些都对目前遗址和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3. 在教育职能中的运用

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对博物馆定义的修订中，将“教育”放在“研究”前面，摆到了第一位，明确了教育是博物馆服务观众的终极目标。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传播文化科学的主要方式。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主要是展示遗址及遗址出土文物，陈列手法一般是直接利用遗址和文物本身的信息，通过文字、图片加以说明，展示方法单一，内容又专业性强，难免让观众觉得枯燥乏味、有距离感、吸引力小。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博物馆理念提倡以人为本，更加注重观众的生理感受和情感需求，这对遗址博物馆提出了挑战。遗址博物馆必须创新展览的内容与形式，尽量贴近观众的生活，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遗址博物馆将口述史运用到展览中可以活化展览形式，将枯燥的平面展示变成鲜活的历史还原，其趣味性、个性化，更容易让文物活起来。同时还能丰富展览内容，增加展览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人来了解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如遗址博物馆中的遗址展示，观众通过文字说明所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静止的，但观众不仅仅想知道“这是什么”“有什么历史文化价值”，可能对“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发掘过程中有什么奇闻异事”更有兴趣。口述史的引入为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改陈提供新的思路，如果把口述史采集到的发掘亲历者的音像资料与多媒体技术结合，放到展览中播放，亲历者绘声绘色的讲述一下子将观众带入遗址发掘的历史场景中，可以给观众更真实的体验。或者在展览结尾处设置小剧场，用大屏幕播放发掘亲历者的口述史访谈影像，让观众有机会坐下来观看。如2018年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后的基本陈列“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集良渚遗址考古80年，特别是近10年考古成果的展览。其中，在“文明圣地”展厅里介绍良渚遗址水利文明的单元就使用了多媒体视频，播放考古发掘领队王宁远研究员讲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和价值。他讲到运用遥感技术在卫

星地图上发现低坝系统的意外之喜，从而确认了整个水利系统，以及对水坝的勘探和发掘；同时，还介绍了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以及它们的防洪和运输功用。相较于文字和图片的说明，这种形式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和认识中国这一最早的经过科学规划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亲历者们所讲述的考古发掘经历，一般人了解较少，而观众又常常对考古工作怀有好奇心，经过亲历者生动的叙述，带有一定的揭秘效果，既满足了观众的探秘心理，又有助于观众了解历史文化内涵。

讲解是博物馆教育工作的主要手段，通过讲解可以帮助观众加深对展品的理解，掌握知识，开阔视野。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可以将口述史的资料运用到讲解词中，除了向观众讲解遗址和文物本身的历史文化内涵，还可以讲讲当时发掘工作的细节、考古工地上的生活、亲历者的心理感受等，让千篇一律的讲解变得生动有趣，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高观众参观学习的兴趣。如徐州龟山汉墓遗址的讲解员在介绍墓主人时，除了讲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还会讲到当年发掘后确认墓主人的经历。1981年发掘龟山汉墓，因墓葬被盗，未发现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可靠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后来当地一名电工在与人聊天中说到他知道墓主人是西汉楚王刘注，而且他手里还有刘注的印章。原来，当年发掘时，为方便墓室内工作，考古队曾请这名电工去安装电灯，电工在墓中布线时捡到印章，就顺手放进口袋带走了。考古队员闻讯后找到电工，向他普及了文物保护法的知识，最终电工上交了印章。讲解中，印章这段失而复得的曲折经历，必定会加深观众对龟山汉墓遗址的认识和记忆。随着科技的进步，语音导览系统在博物馆中广泛应用，遗址博物馆的语音导览系统不仅可以录制专业讲解员对遗址和文物的通俗介绍，也可以放入口述史访谈录音，观众在参观遗址的过程中，沉浸于亲历者讲述的考古发掘故事，这能让观众有更真实的体验，对展览留下更为深刻的记忆。

博物馆的教育方法多种多样，举办讲座就是一种重要方法。遗址博物馆可以举办讲座，邀请亲历者给观众进行现场讲述，包括当时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经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遗址和文物的认识与研究。之后观众再配合参观，会对遗址和文物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例如，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曾举办文博大讲堂，邀请参与和主持西汉广陵王墓发掘的邹厚本先生讲述墓葬的发掘过程。邹厚本先生给观众讲了当年发掘的经历和趣事，并对墓葬的布局、结构、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度解读，然后根据自己的认识与研究阐释了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其实“人”才是交互式最强的媒介，没有什么方法和技术能更好地建立起观众和展品之间的连接。所以亲历者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更能吸引观众去认识和了解展品，最终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

#### 四、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新的博物馆理念的出现，以及博物馆观众的多元化，都对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博物馆需要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创新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功能。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着一整套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遗址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探索口述史与博物馆工作的有机结合，将口述史运用到收藏、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宣传教育等各个环节，发挥口述史的优势，更好地实现遗址博物馆的功能，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促进遗址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 注释

- [1] 段炼：《探索与实践：博物馆与口述历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5页。
- [2] 〔美〕唐纳德·里齐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 [3] 杨学功：《试论口述史料在革命类纪念馆展陈中的运用——以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为例》，《中国纪念馆研究》，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157页。
- [4] 侯春燕：《口述历史博物馆化：博物馆学发展新趋势》，《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侯春燕：《口述历史在博物馆展览中的角色强化》，《博物院》2018年第4期。
- [5] 苏东海：《与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鹤田总一郎对话录》，《中国博物馆通讯》1987年第4期。
- [6] 苏东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页。
- [7] 侯春燕：《口述历史博物馆化：博物馆学发展新趋势》，《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3期。
- [8] 崔光海：《中国遗址博物馆建筑研究初探》，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3页。
- [9] 杜永梅：《谈遗址博物馆的科研发展方向——以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为例》，《博物馆研究》2012年第4期。
- [10]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页。